

# 以权威结论平息“公文大战”

很多时候，人们总说医患关系难处，说白了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同时又缺少一个双方都能信任的权威第三方。正是由于这种权威性的缺失，医患发生纠纷时就只能“短兵相接”了。



评论员观察

近日，一名孕妇在北医三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三份官方声明的接连出现，让事件迅速在网上发酵。先是死者单位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发函，请求医院给出一份真实、完整的调查结论；紧接着，北医三院回应事件经过，并指出死者家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中国医师协会随后发布声明支持院方，质疑中科院理化所发声明程序的合理性。

就这样，一场医疗纠纷变成了“比嗓门”，甚至连“披露”死者过往就诊经历的小道消息，都开始在网

络上流传。引爆舆论的那封公函，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对真实、完整调查结论的诉求，还是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对于医疗纠纷，无论是通过哪种途径加以解决，保障患者一方的知情权，由权威机构出具权威性的调查结论，都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三份公文隔空大战之后，死者丈夫曾发帖，要求院方澄清“医闹”传闻，并要求公布“医闹”当天医院的视频监控。应该说，只要公布视频这一关键证据，是否发生过“医闹”自然就有了公断。事实上，权威性的死因报告，起到的也是类似监控视频的作用，既是给死者家属以交代，更是为责任判定提供有力依据。现在医患双方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患者死因，是像家属所言“严重渎职行为所致”，还是如院方回应的死者所

患疾病“抢救率极低、死亡率极高”，都需要权威解释。

中科院理化所以公函形式对医院提出“给出调查结论”的要求，程序上固然值得商榷，但诉求本身并不过分。即便考虑到死者家属的心情，这也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责的医院应该做到的。更何况，考虑到医患双方现实中的不对等地位，尤其对于医学知识和医护过程的掌握存在巨大差异，法律上也要求医疗机构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而从常理而言，之所以由死者单位以发出公函的形式“出面”，很大的可能就是家属以个人名义提出的诉求并未得到院方的足够重视。

当然，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是得看最终的调查结果，既然几方都声称要走法律途径，事件过程中也有报警、出警的情况，相信法律会

给出公正的论断。仔细想来，如果各方一开始都能像各自所说的那样，完完全全按法律来，应该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很多时候，人们总说医患关系难处，说白了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同时又缺少一个双方都能信任的权威第三方。正是由于这种权威性的缺失，医患发生纠纷时就只能“短兵相接”了。

回头再看这场“公文大战”，无非就是短兵相接的医患双方都找到了“后援团”，问题没解决，场面却更加混乱了，相比医院内的“武斗”，只不过是方式更“文明”了一点。或许更该思考的是，究竟该如何在医患之间建立起能够赢得双方信任的权威，如果说与医院关系更为密切的卫生部门或地方医学学会无力扮演这样的角色，下一步又该做怎样的改革？

## 媒体视点

1月16日，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召开。针对2015年中国股市经历的罕见异常波动，证监会主席肖钢总结反思，承认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

## 股市“脱实向虚”应成监管重点

这些反思，不乏务实性。而依我看，肖钢提到的发展资本市场要“遏制过度投机，决不能‘脱实向虚’，更不能‘自娱自乐’”，尤其是切中要害之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若股票价格与实体企业价值严重背离，过度投机形成的泡沫必然会带来恶果。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尽管整个市场估值水平大幅回归，但“脱实向虚”现象并未根除，大盈蓝筹股价逐渐接近甚至低于内在价值，但市场炒新炒小投机之风仍在。像去年神创板有些个股股价短期暴涨至500多元，但有的每股盈利只有几分钱，其背后被广泛认为有公募基金抱团操纵，但时至今日，查处这方面市场操纵的消息还没有。

说到底，要切断资本市场“脱实向虚”和股市异常波动的关联，需强化监管针对性，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完善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促使上市公司将更多红利给投资者分享，以形成资本市场良性发展循环。(摘自《新京报》，作者熊锦秋)

## 证监会“学有所得”自己给自己打分

肖钢对于股市的“异常波动”是有反思的：充分反映了我国股市不成熟、不成熟的交易者、不完备的交易制度、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不适应的监管制度等，也充分暴露了证监会监管有漏洞、监管不适应、监管不得力等问题，我们必须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学有所得……

这话搁10年、20年前也能通用，搁今天却不是个味。股市都这样了，证监会还在“学有所得”。股民数以万亿计的投资化为泡沫，敢情只是在给证监会交学费？哪一次试错不是以股民的损失换取管理层的教训？这时候，排在首位的“不成熟”反而是交易者了，是摸不到具体人、触不到责任者的交易制度、市场体系和监管制度了。

不成熟的交易者一百年后还会有的，不完备的制度和不完善的监管却还在年年讲、月月讲，由此可见，真正不成熟的恰恰是证监会系统和证券期货行业的专业性、责任性和法治性。证监会的总结大会这么评判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典型的裁判给自己的一次打分。这个分，打得没诚意，打得不专业，也不可能打出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2016来。(摘自《钱江晚报》，作者刘雪松)

## 监考老师病发身亡，学生何以“无动于衷”

### 大家谈

□陈伟

1月14日，是江苏泰州统考的日子，而在泰兴济川中学，一名三十六岁的吴姓女教师在监考中死去，等到交卷结束才被人发现。令人惊讶的是，已经读初中的学生们，竟然能在目睹吴老师最后挣扎呻吟中平静地做完题。突发性疾病，往往有一个急救时间，有些生命原本是可以挽回的。

一位考生家长得知女儿反馈的信息，在朋友圈中不由地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中午放学回来，女儿谈到监考老师死了！那表情，那语气，没有一点点的怜惜……孩子们学会了考试、交卷，却完全没有有了生活基本的常识！拼命地看重分数，教出了一帮生活中的小傻瓜！”这位家长的慨叹，不能不说击中了中国教育问题的要害。应试教育，将学生过早地训练成了缺乏基本常识和生活技能的做题机器。到最后，当教师需要学生救命时，却发现学生正埋头做题，为了多得几分，而全然忽略你的存在。交卷时，看着你口吐白沫挣扎，竟然无动于衷。我们不能奢望每个学生都拥有丰富的生活常识，但一个班，总得有那么几个机敏、能干一些的学生吧。

想想我上学的那个年代，虽然学校办学条件差，但学生的精神面貌很好，他们的天真、野性、活力还在。特别是成绩较差的同学，往往

越有人情味。他们在老师和同学心目中是拖后腿的人，是差生，但他们往往具有侠义精神。而且，和他们交往，有一种摆脱书本课堂的感觉，如同生活在一个没有学业、可以尽情游玩的世界。那些成绩很好的人，则做事小心，和他们交往很费心思。为了名次的起落，大家暗中较劲；为了不让别人超过自己，把优质的参考资料藏起来，等等。

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我现在才明白，成绩差的同学有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被应试教育摧残的程度轻，成绩越差，往往天性保存得越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抵制了应试教育对人的规训，反而能理解人情，理解生活。他们不去为一分而争，不去为了当班干部而令人不适地“积极表现”，他们甚至不太在乎老师的批评、辱骂。用老师的话来说，他们皮厚、憨。但他们的生活，也往往更有几分乐趣。他们的生存能力，无疑比那些考高分的要强得多。他们的为人，也往往更值得人们信赖。

回到这个监考老师死亡事件上来，如果这个班里，多几个我上学时身边那样的差生，这位老师就有及时获救的希望。那样的差生，考试东张西望，自然会第一时间发现老师的异常；他们胆子大，说话声音也大，定会第一时间站起来呼救；他们会不顾考场纪律，不在乎成绩，第一时间冲出去喊隔壁老师帮忙，甚至有的同学还会直接想办法，背老师去学校医务室。他们保存着人在原始的状况下，救助同伴的本能和冲动。

可惜的是，现在的中小学，还容得下这样的野学生吗？应试教育，让学生脱离了生活，让他们丧失了“现实感”。一些地方学校，装模作样地搞一些效法“陶行知”的教改，然而，由于不敢对中高考这样的指挥棒发起实质性的挑战，不过是用过去的名号，掩盖应试教育的残酷。不是说不要考试，而是说不应将考高分当成教育的目标。可是，看看我们的教育，中小学生因学业压力太大写遗书跳楼的事情，发生的还少吗？

应试教育并不能让每个人都实现拿高分的目标，却成功地让学生(不论成绩好坏)丧失了基本的常识，用那位家长的话来说，变成了“小傻瓜”。因为，常识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与人的交往。而常识和一个人的良知、公共责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应试教育让人没有时间来接触丰富的生活，害了学生，最后也害了教师。

让小学生把核心价值观背得滚瓜烂熟，和让学生多一点点对生命的认知，多一点点生活常识，哪个更重要？如今，一名监考老师用生命给出了答案。可是我们的教育部门，为何不能多关心一下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呢？他们的眼睛只盯着领导满意不满意，只顾着上线率录取率等政绩，只想着参加各种创优评选，只顾着安排迎接领导检查。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的饭碗不是教师和学生给的，相反，教师和学生还要反过来求着他们才有工作才有学上！(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 聚焦“城市病”系列谈之六

### 完善事前评估，避免“新”悲剧重演

□本报记者 张刚

前几天，一位省人大代表在视察重点工程建设时，给正描绘大片高楼拔地起的某政府领导泼了冷水：一届政府有一届政府的重点工程重点项目，蓝图描绘得很不错，但建成后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效果，没有人来评估。蓝图变烂尾层出不穷，却仍然是“来一个新的，再来一个新的”。

代表如此直言，正是说明眼下在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怪现象：新概念层出不穷，建设仍在追高求大，愿望是好的，但不一定能够达到当初规划设计的效果。国内一些城市这种情况普遍存在，省城也不能免俗。一些项目建起来后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亲民、近民的作用，全民所享的效果自然也谈不上，反倒是在追高求大的狂欢中，把特色丢了。

我们姑且不说城市建设要保

持自己的特色，仅对追高求大这一现象，能不能真正地评估一下它的效果？一直以来，城市建设中把高和大，作为一个城市的坐标和对外展示的标志，甚至几个城市为谁的游乐场摩天轮全国最高而争得不可开交。可仔细想想，就算全世界第一高，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问题的核心在于，第一高、第一大建成之初，应有效评估如何能够保证它的正常运行，在建设之前拿出可行性的评估报告，而不是凭领导一时的冲动，顺手一圈，说拆就拆，说建就建。试问，有多少具有文化价值或历史价值的建筑在一声令下后轰然倒下，只留得人们一片叹息。

轮番上演的“来一个新的，再来一个新的”，透露着无奈和苦涩，见证着建成之日就是烂尾之日的怪状，大家都知道无法避免却无人对此负责。很多时候，政府还为此当了冤大头，不停往里

贴钱以勉强保证豪华场馆的正常运营。

要避免“新”悲剧重演，一是在建设之前，必须进行科学的论证，不能承办一次活动，就建一堆标志性建筑，这样那样的世界性的、国家级的盛会有的是，但是土地和财政资源是有限的；二是对已经建设起来的楼堂馆所，一定要积极寻找社会化的运行方式，摆脱政府掏钱建政府掏钱养的窘境，让其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活力。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事实证明高和大已不是大城市追求的终极目标，某某标志区也未必是一座城市赖以自豪的坐标，反倒是一些亲民的、民众能够参与其中的，而且能够保证自己经过市场化、社会化运行检验的综合体，才是健康的可行。

■本报投稿信箱：

qilipinglun@sina.com